

明代浙江民俗及其变异

徐华龙¹，倪敏²，向焕星²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 200020；2. 上海大学，上海 200020)

【摘要】明代浙江风俗有非常强烈的地方文化色彩，它的形成融合了其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内容，并且加以本土化，形成自己的地方文化。这里介绍的是那个时代的婚姻、商业习俗、服装特点、饮食文化以及家庭器皿等方面，从中可以发现它的演变和发展。

【关键词】浙江；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834 (2008) 01-0006-06

明代的浙江民俗既传承了过去的历史，也有了新的民俗。因为政权更迭，主宰人们的思想也随着发生变化，因此新的民俗也就产生了。

特别是岁时风俗，恢复了传统，已经没有元代留下的西北游牧民族的文化色彩，而形成自己本地的文化特色，其中以杭州为代表的城市，更体现了明代文化的特征。关于这一点，在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有比较详尽的记载：

正月朔日，官府望阙遥贺，礼毕，即盛服诣衙门，往来交庆。民间则设奠于祠堂，次拜家长，为椒柏之酒，以待亲戚邻里。以春饼为上供，燕栗炭于堂中，谓之旺相。贴青龙于左壁，谓之行春。插芝麻梗于檐头，谓之节节高。签柏枝于柿饼，以大橘承之，谓之百事大吉。自此少年游冶，翩翩征逐，随意所之，演习歌吹。或投琼买快，斗九翻牌，博成赌闲，舞棍踢球，唱说平话，无论昼夜，谓之放魂。至十八日收灯，然后学子攻书，工人返肆，农商各执其业，谓之收魂。

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前后张灯五夜。相传宋时止三夜，钱王纳土，献钱买添两夜。先是，腊后春前，寿安坊而下至众安桥，谓之灯市，出售各色华灯。其像生人物，则有老子、美人、钟馗捉鬼、月明度妓、刘海戏蟾之属。花草则有栀子、葡萄、杨梅、柿橘之属。禽虫则有鹿、鹤、鱼、虾走马之属。其奇巧则琉璃球、云母屏、水晶帘、万眼罗、玻璃瓶之属。而豪家富室，则有料丝、鱼鱿、彩珠、明角、镂画羊皮、流苏宝带，品目岁殊，难以枚举。好事者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谓之猜灯。或祭赛神庙，则有社伙鳌山，台阁戏剧，滚灯烟火，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阗彻旦。市食则糖、粽、粉团、荷梗、芋羹、瓜子，诸品果蓏。嬉灯交易，识辨银钱真伪，纤毫莫欺。人家妇女，则召帚姑、针姑、苇姑、笄箕姑，以卜问一岁吉凶。乡间则有祈蚕之祭。俗子以上元为天官赐福之辰，亦有诵经持斋，不御荤酒者。

二月朔日，唐、宋时谓之中和节，今虽不举，而民间犹以青囊盛五谷瓜果之种相遗，谓之献生子。自是城中士女，已有出郭探青，扫墓设奠者。湖中游舫，赁价日增矣。二日，士女皆戴蓬叶，谚云：“蓬开先百草，戴了春不老。”

春日，妇女喜为斗草之戏。黄子常《绮罗香》词云：“绡帕藏春，罗裙点露，相约莺花丛里。翠袖拈芳，香沁笋芽纤指。偷摘遍，绿迳烟霏；悄攀下，画阑红紫。扫花阶褥展芙蓉，瑶台十二降仙子。芳园清昼乍永，亭上吟吟笑语，妒穠夸丽。夺取筹多，赢得玉趺踟蹰。凝素靥，香粉添娇；映黛眉，淡黄生喜。绡胸带空系宜男，情郎归也未？”

收稿日期：2007-12-01

二月十五日在花朝节。盖花朝月夕，世俗恒言二、八两月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为花朝，八月半为月夕也。是日，宋时有扑蝶之戏，今虽不举，而寺院启涅槃会，谈《孔雀经》，拈香者扈至，犹其遗俗也。十九日，上天竺建观音会，倾城士女皆往。其时，马塍园丁，竞以名花荷担叫鬻，音中律吕。黄子常《卖花声》词云：“人过天街晓色，担头红紫。满筠筐，浮花浪蕊。画楼睡醒，正眼横秋水。听新腔，一回催起。吟红叫白，报得蜂儿知未？隔东西，余音软美。迎门争买，早斜簪云髻。助春娇，粉香帘底。”乔梦符和词云：“侵晓园丁叫道，嫩红娇紫。巧工夫，攒枝短蕊。行歌伫立，洒洗妆新水。卷香风，看街帘起。深深巷陌，有个重门开未？忽惊他，寻春梦美。穿窗透阁，便凭伊唤取。惜花人，在谁根底？”

三月三日，俗传为北极佑圣真君生辰。佑圣观中，修崇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启醮，酌水献花者。是日，观中有雀竿之戏。其法，树长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人攀缘而上，舞蹈其颠，盘旋上下，有鸽子翻身、金鸡独立、钟馗抹额、玉兔捣药之类，变态多方。观者目瞪神惊，汗流浹背，而为此技者，如蝶拍鸦翻，蓬蓬然自若也。是日，男女皆戴荠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

清明，从冬至数至一百五日，即其节也。前两日谓之寒食，人家插柳满檐，青荫可爱，男女亦成戴之。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是日，倾城上冢，南北两山之间，车马阗集，而酒尊食罄，山家村店，享俊遨游，或张幕藉草，并舫随波，日暮忘返。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肋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而外方优妓，歌吹觅钱者，水陆有之，接踵相应。又有买卖赶趁。香茶细果，酒中所需。而彩妆傀儡，莲船、战马，铙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童曹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贴“清明嫁九娘，一去不还乡”之句于楹壁间，谓如此，则夏月无青虫扑灯之扰。僧道采杨桐叶染饭，谓之青精饭，以馈施主。

三月二十八日，俗传为东岳齐天圣帝生辰，杭州行宫凡五处，而在吴山上者最盛。士女答赛拈香，或奠献花果，或诵经上寿，或枷锁伏罪，钟鼓法音，嘈振竟日。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诸色细果，馈送亲戚比邻，谓之七家茶。富室竞侈，果皆雕刻，饰以金箔，而香汤名目，若茉莉、林禽、蔷薇、桂蕊、丁檀、苏杏，盛以哥、汝瓷瓿，仅供一啜而已。

四月八日，俗传为释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龙华会。以小盆坐铜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铙鼓迎往富家，以小构浇佛，提唱偈诵，布施财物。有高峰和尚偈云：“呱声未绝便称尊，搅得三千海岳昏。恶水一年浇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端午为天中节，人家包黍秫以为粽，束以五色彩丝。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盘中，围以五色蒲丝，翦皮金为百虫之象，铺其上。却以葵榴艾叶，攒簇华丽。或以彩绒杂金线缠结经筒符袋，互相馈遗。僧道以经筒轮子，辟恶灵符，分送檀越。而医家亦以香囊、雄黄、乌发油香，送于常所往来者。家家买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标以五色花纸，贴画虎蝎或天师之象。或朱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揭之楹间。或采百草以制药品，觅虾蟹以取蟾酥，书“仪方”二字，倒贴于楹，以辟蛇虺。

六月六日，宋时作会于显应观，因以避暑，今会废，而观亦不存。自此游湖者多于夜间停泊湖心，月饮达旦，而市中敲铜盏卖冰雪者，铿聒远近。是日，郡人舁猫狗浴之河中，致有汨没淤泥，踉跄就毙者，其取义竟不可晓也。

立秋之日，男女成戴楸叶以应时序。或以石楠红叶翦刻花瓣，扑插鬓边。或以秋水吞赤小豆七粒。

七夕，人家盛设瓜果酒馔于庭心或楼台之上，谈牛女渡河事。妇女对月穿针，谓之乞巧。或以小盒盛蜘蛛，次早观其结网疏密，以为得巧多寡。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儿，衣以彩服而卖之，号为摩喉罗。

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俗传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斋诵经，荐奠祖考，摄孤判斛。屠门罢市。僧家建盂兰盆会，放灯西

湖及塔上、河中，谓之照冥。官府亦祭郡厉邑厉坛。张伯雨《西湖放灯》诗云：“共泛兰舟灯火闹，不知风露湿青冥。如今池底休铺锦，此夕槎头直挂星。烂若金莲分夜炬，空于云母隔秋屏。却怜牛渚清狂甚，苦欲燃犀走百灵。”刘邦彦诗云：“金莲万朵漾中流，疑是潘妃夜出游。光射鱼龙离窟宅，影摇鸿鸟乱汀洲。凌波未必通银浦，趁月偏怜近彩舟。忽忆少年清泛处，满身风露独凭楼。”

重九日，人家糜栗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铺以肉缕，标以彩旗，问遗亲戚。其登高饮燕者，必簪菊泛萸，犹古人之遗俗也。又以苏子微渍梅滴，杂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颗，名曰春兰秋菊。

霜降之日，帅府致祭旗纛之神，因而张列军器，以金鼓导之，绕街迎赛，谓之扬兵。旗帜、刀戟、弓矢、斧钺、盔甲之属，种种精明。有飘骑数十，飞辔往来，逞弄解数，如双燕绰水、二鬼争环、隔肚穿针、枯松倒挂、魁星踢斗、夜叉探海、八蛮进宝、四女呈妖、六臂哪吒、二仙传道、圯桥进履、玉女穿梭、担水救火、踏梯望月之属，穷态极变，难以殚名。腾跃上下，不离鞍轻之间，犹猿猱之寄木也。

十月朔日，人家祭奠于祖考，或有举扫松、浇墓之礼者，八日则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菌、枣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

十五日为下元节，俗传水官解厄之辰，亦有持斋诵经者。

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谓之扫疥。冬至，谓之亚岁，官府、民间，各相庆贺，一如元日之仪。吴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说。春糰糕以祀先祖，妇女献鞋袜于尊长，亦古人履长之义也。十二月二十四日，谓之交年，民间祀灶，以胶牙饧、糯米花馆、豆粉团为献。丐者涂抹变形，装成鬼判，叫跳驱傩，索乞利物。人家各换桃符、门神、春帖、钟馗、福禄、虎头、和合诸图，黏贴房壁。买苍术、贯众、辟瘟丹，柏枝、彩花，以为除夕之用。自此街坊箫鼓之声，铿钩不绝矣。僧道作交年疏、仙术汤，以送檀越，医人亦馈屠苏袋、同心结及诸品汤剂于常所往来者。

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齐屋，举火焚之，谓之机盆，烟熏烛天，烂如霞布，爆竹鼓吹之声，远近聒耳。家庭举燕，则长幼咸集，儿女终夜博戏藏钩，谓之守岁。燃灯床下，谓之照虚耗。以赤豆作粥，虽猫犬亦食之。更深人静，或有祷灶请方，抱镜出门，窥听市人无意之言，以卜来岁休咎。是日，官府封印，不复金押，至新正三日始开。而诸行亦皆罢市，往来邀饮。盖杭人奢靡，不论贫富，俱竞市什物，以庆嘉节。而光饰门户，涂泽妇女，衣服钗环之属，更造一新，皆故都遗俗也。

这些记载十分详细，基本上将杭州岁时风俗描写殆尽。

仅举立春而言，在杭州附近的仁和县、钱唐县，要轮流承办立春祭祀活动。“仁和县于仙林寺，钱唐县于灵芝寺。前期十日，县官督委坊甲，整办什物，选集优人、戏子、小妓，装扮社伙，如昭君出塞、学士登瀛、张仙打弹、西施采莲之类，种种变态，竞巧争华，教习数日，谓之演春。至日，郎守率僚属往迎，前列社伙，殿以春牛，士女纵观，阗塞市街，竞以麻、麦、米、豆，抛打春牛。其优人之长，假以冠带。骑驴叫茨，以隶卒围从，谓之街道士。过官府豪门，各有赞扬致语，以缺利市。遇褻褻猥汉，冲其节级，则捥而杖之，亦有谑浪判语，不敢与较。至府中，举燕，鞭牛而碎之，随以彩鞭土牛，分送上官乡达。而民间妇女，各以春幡春胜，镂金簇彩，为燕蝶之属，问遗亲戚，缀之钗头。举酒则缕切粉皮，杂以七种生菜，供奉筵间，盖古人辛盘之遗意也。”（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

在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有歌咏赋诗的习俗，特别是文人雅士在这一天进行唱和更是热闹非凡。

桂孟平有《看灯词》十五首，杭人称之。瞿宗吉效之，亦作十五首，其词云：“东家斫竹缚山棚，西舍邀人合风笙。官府榜文初出了，今宵喜得晚西晴。”“都司烟火揭高竿，万斛珠玑撒玉盘。看到顶头齐喝采，紫葡萄上月团团。”“南瓦新开影戏场，满堂明烛照兴亡。看看弄到乌江渡，犹把英雄说霸王。”“销金小伞揭高标，红藕青梅满担挑。依旧承平风景在，街头吹彻卖饧

箫。”“傀儡装成出教坊，彩旗前引两三行。郭郎鲍老休相笑，毕竟何人舞袖长。”“宝盖高悬画阁深，生红绣带细描金。就中好个流苏结，万转千回共一心。”“香带交垂八尺高，红灯影里见丝毫。傍人总道工夫巧，一月香闺弄剪刀。”“女伴相邀趁晚晴，暂离妆阁步轻盈。当街怕有巡军见，只向齐檐屋下行。”“随分梳妆浅淡衣，像生花朵闹蛾飞。年时也有烧香愿，同上吴山及早归。”“百媚怀春不自由，好妆金屋贮风流。谁教误向灯街见，断送痴人死未休。”“风帘珠翠动纷纷，笑语声喧隔户闻。明月满街天似水，不知何处着行云。”“文锦坊西后市南，闹竿挑过百花篮。少年游手夸轻俊，拾得双头碧玉簪。”“雪白春衫窄窄裁，青茸狸帽紫茸胎。灯前莫怪轩昂甚，新与官员养马来。”“喝雉呼卢夜不眠，东邻西舍笑灯前。明朝还要当门户，里长来收坐柜钱。”“村里儿童暂入城，随群齐上大街行。归来彻夜浑忘睡，从此春田懒去耕。”词中所言风俗，与今无异，独“新与官员养马来”一句难解，盖其时藩、臬而下皆乘马，而养马之家颇怙势也。刘邦彦《上元五夜观灯》诗，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晴，千门翠竹结高棚。珠帘半卷将团月，玉指初调未合笙。新放华灯连九陌，旧传金钥启重城。少年结伴嬉游去，遮莫鸡声下五更。”十四夜云：“灯光渐比夜来饶，人海鱼龙混暮潮。月照梅花青锁闥，烟笼杨柳赤阑桥。钿车过去抛珠果，宝骑重来听玉箫。共约更深归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声送管弦，九衢灯烛上薰天。风回鳌背星球乱，云散鱼鳞璧月圆。逐队马翻尘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归迟不属金吾禁，争觅遗簪与坠钿。”十六夜云：“次第看灯俗旧传，宝箏重按十三弦。人心未必今宵绝，兔魄还如昨夜圆。尚觉繁华夸乐土，何须广乐听钧天。追欢独羡儿童健，静对梅花忆往年。”十七夜云：“绣帘窄地护轻寒，明月来迟风蜡残。风扫烟花春烂熳，云沉星斗夜阑珊。醉敲马橙还家去，谁抱龙香隔院弹。试看烧灯如白日，鳌山无影海漫漫。”（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

有的风俗到了明代已经荡然无存，有的也仅仅有很少的遗迹，有的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如：“二月朔日，唐、宋时谓之中和节，今虽不举，而民间犹以青囊盛五谷瓜果之种相遗，谓之献生子。”大家知道“中和节”是唐宋时代的民俗，但从《西湖游览志余》的记载中，“中和节”到了明代就已经不存在，其中原因虽不清楚，但是到明代虽然不存在，但是人们依然在过这样的节日，只是内容有了变化，成为“献生子”习俗，并且延续了“青囊盛五谷瓜果”的祭祀方法。众所周知，民俗的改变是一种社会演进的要求，也就说“中和节”到了明代已经失去其生存的土地，人们不再相信“中和节”而改相信求生子了。

再如：“重九日，人家糜栗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铺以肉缕，标以彩旗，问遗亲戚。其登高饮燕者，必簪菊泛茱，犹古人之遗俗也。”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知道所谓“登高饮燕”不是明代的风俗，而是明之前的习俗，当时在浙江重九的时候，是蒸糕，在糕上“铺以肉缕，标以彩旗”，并将这些糕点来送给自己的亲戚，以作为联系家族的方式。与今天所说的重九日登高不是一回事。

除了在节日的整体上与传统有很大不同之外，在许多节日的细节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在除夕的时候，将家里什物都一概卖掉，而不管是否是穷人还是富人，这明代以前的习俗，其原因是“杭人奢靡”，因此“不论贫富，俱竞市什物，以庆嘉节”，“而光饰门户，涂泽妇女，衣服钗环之属，更造一新，皆故都遗俗也”。也就是说，这样的习俗并不是明代的，而是元代的历史遗存，所以在明代人看来这是非常有趣，同时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方言方面，明代的浙江人体现了独有的文化风格，并有自己的组词的习惯和读音的方法。这些组词和读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字方法，同时也加入浙江人自己的方言特色。在此中间，杭州人的语言最具有代表性。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五卷：“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者，如以秀为鲫溜，以团为突栾，以精为鲫令，以俏为鲫跳，以孔为窟笼，以盘为勃兰，以铎为突落，以窠为窟陀，以圈为窟栾，以蒲为鹈卢。有以双声而包一字，易为隐语以欺人者，如以好为现萨，以丑为怀五，以马为杂嗽，以笑为喜黎，以肉为直线，以鱼为河戏，以茶为汕老，以酒为海老，以没有为埋梦，以莫言为稀调。又有诨本语而巧为俏语者，如诨人嘲我曰溜牙，有谋未成曰扫兴，冷淡曰秋意，无言默坐曰出神，言涉败兴曰杀风景，言胡说曰扯淡，或转曰牵冷，则出自宋时梨园市语之遗，未之改也。”

在这些杭州语言里，根据田汝成的分析，不少是出于宋代的“梨园市语”，或者说明代杭州的语言很多词汇是宋代戏曲、市井语言的遗存，其实，除此之外，从宋代开始，北方人大量移居杭州，带来了许多北方的语言和语音，从而加入杭州传统的语言之中，并融合成为新的语言习惯和语言色彩，这就是杭州语言的演进、变化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

另外一方面，杭州人在语言上同样有天赋，很会说隐语，因此常常被认为是欺负外乡人所用的语言。所谓隐语，开始是行业内流行的语言，有一定的隐蔽性，当然有的隐语慢慢地逐渐公开，变成普通人们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语言和词汇。由于杭州与浙江其他地方有比较大的差异，也遭到别处人们的指责和不恭。“《辍耕录》言：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如物不坚致曰憨大，暗换易物曰捌包儿，粗蠢人曰杓子，朴实曰艮头。《白猿髓》言：杭俗浇薄，语年甲则曰年末，语居止则曰只在前面，语家口则曰一差牙齿，语仕禄则曰小差遣。此皆宋时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日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梨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讳低物为鞭，以其足下物也，复讳鞍为撒金钱。则又义意全无，徒以惑乱观听耳。”（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五卷。）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五卷就记载了杭州人的方言俗语，今将其中一部分收集于下：杭人言宁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汉书》：“杨越之人耐暑。”注：“与能同。”李太白诗“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读如能。言人胸次不坦夷，逞独见以忤人者曰（上匡下犬，上吉下大），音如列挈，《汉书》：“（上匡下犬，上吉下大）而无志节。”言人愚不省事者曰怡，魏万诗：“五方造我语，知我非偷痴。”亦曰憨，《隋书》：“袁宝儿多憨态，得宠怜。”言人犹与不前猛者曰墨屎，音如眉痴。蕴藉不躁暴者曰眠蜒，音如緇忝，出《列子》。又皮日休《反招魂》：“上暧昧而下墨屎。”言人进退不果曰倍儂，音如炽赋，司马相如赋“伋以怡僚。”柳子厚《梦归赋》：“纷若倚而佞儂兮。”言事频频不易作者曰郑重法，《王莽传》：“非皇天所以郑重符命之意。”言人无用者曰不中用，《史记》：“始皇闻卢生窃议亡去，怒曰：‘吾将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骂人曰老狗，《汉武故事》：“上尝语栗姬，怒弗应，又骂上为老狗。”言纷纭不靖曰海红花，盖海红花乃山茶之小者，开时最繁闹，故借以为喻。骂人桀骜不循理者曰杂种，《晋书·前燕载记》赞曰：“蠢兹杂种，奕世弥昌。”见人有不当意者曰嘴鼻，《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将毕资伦不肯降，系狱十四年，及盱眙守将纳合买住降，北望哭拜，谓之辞故主。资伦见买住，骂曰：“国家未尝负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嘴鼻也。”言人聆言不省曰耳边风，杜荀鹤诗：“百岁有涯头上雪，万般无染耳边风。”作事助力曰阿痊痊，武后时，南皮县丞郭胜静每巡乡，唤民妇托衣缝补而奸之，其夫至，缚胜静鞭数十，主簿李憺往救解之，胜静羞讳其事，但忍痛不禁，低声唱云：“胜静不被打，阿痊痊。”冲寒而肌粟卒起曰痒襟，韩退之《斗鸡》诗：“磔毛各痒痒。”日光微暖曰温暾，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暾。”白乐天诗：“池水暖温暾。”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微之诗：“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问何人曰阿谁，讹为兀谁，刘先主破成都，置酒为乐，庞统谏曰：“伐人之国而乐之，非仁也。”先主怒曰：“武王胜商，前歌后舞。”既而悔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曰：“君臣皆失。”言人有病曰不快，《华佗传》：“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又曰不耐烦，《庾炳之》传：“为人强急而不耐烦。”俚语又言要不得，盖人有病，则嗜欲不遂，要吃吃不得，要行行不得，意义虽粗，亦有可解。迁居而邻友治具过饮曰暖屋，亦曰暖房，王建《宫词》：“太仪前日暖房来。”言不洁曰麀糟，“霍去病麀臯阑下”，注云：“尽死杀人为麀糟。”盖血污狼藉之意也。诟人佣工曰客作，《三国志》：“焦光饥则为人客作，饱食而已。”贱丈夫曰汉子，《北齐书》：“何物汉子，与官不就？”女子及笄曰上头，而娼女初荐寝于人亦曰上头，花蕊夫人《宫词》：“新赐云鬟使上头。”呼女子之贱者曰丫头，刘宾客诗：“花面丫头十二三。”称善能营生者曰经纪，唐滕王、蒋王皆好聚敛，太宗尝赐诸王帛，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鄙人之庸贱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传》：“任宣谓霍禹曰：‘使乐成小家子得幸大将军。’”言日间小食曰点心，《唐史》郑惨夫人云：“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言人作事无据者曰没雕当，又曰没巴鼻，苏长公诗云：“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言人不通时宜者曰方头，陆鲁望诗：“头方不会王门事，尘土空缁白芝衣。”事相邂逅曰豆湊，盖斗湊之讹也。或言吴越风俗，除日互擎炒豆交纳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殆此语所从出欤？事多褒贬曰包弹，盖宋人以包孝肃多所弹劾，故云包弹，畏惮之词也。言人虚伪不检者曰楼头，盖宋时何家楼下多亡赖，以滥恶物欺人，其时有何楼之号，楼头者，盖何楼之恶魁也。言人举止仓皇者曰麾窟马鹿，盖四物善骇，见人则跳趣自窜，故以为喻。又曰鼠张猫势，亦此意也。言人仪矩可喜者曰庸峭，音如波峭。庸峭，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俏之意也。

在信仰方面，浙江人相信太岁。如果动土，一定要得到太岁的同意，否则会有灾难。太岁神，本为道教的星辰尊称，简称为“太岁”，或称为“岁神”、“岁君”、“岁星”等，也就是年神，是诸神之中最有权力的年神，掌管人间一年的吉凶祸福，统摄众神。民间传说犯冲太岁者，不宜在该年的“岁破”位兴工动土，否则招至灾殃。在明代，“董表仪，家住沙河塘，欲搬屋掘土，术者言：‘太岁方不可兴工。’董不信。既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块漫漫然，人言即太岁也。董甚悔恶，投诸河，后亦无祸”（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五卷）。从这个记录中，可以发现太岁信仰非常厉害，董表仪从开始不相信，到后来他“甚悔恶”，

将肉块投入河中，这说明了在明代之前信奉太岁的人不是很多，到了明代人们开始逐渐地相信太岁信仰，这个故事就告诉这样一个道理，信奉太岁的在浙江不在少数，而这位董表议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这在民俗方面，就属于一种信仰的变异状态。

除了相信太岁外，在浙江人的信仰里，还有五通神。在《聊斋志异》里有“五通神”一文，文前就说：“南有五通，犹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可驱遣；而江浙五通，则民家美妇辄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为害尤烈。”

所谓五通神，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于一夜梦见数十万阵亡无主的将士向他哭诉，于是他下令民间要供奉“五通”神位，让他们得以享受百姓的祭祀。另说五通神为财神，人们祭祀它是希望它引财入门，或出行获利。据说，这些鬼神喜欢奸淫妇女，弄得老百姓哭笑不得。

在明代，杭州人最相信五通神。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五卷：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圣，姓氏源委，俱无可考，但传其神好矮屋，高广不逾三四尺，而五神共处之，或配以五妇。凡委巷若空园及大树下，多建祀之，而西泠桥尤盛。或云，其神能奸淫妇女，输运财帛，力能祸福见形，人间争相崇奉，至不敢启齿谈及神号，凛凛乎有摇手触禁之忧，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

这则记载也说明，作者也非常困惑，不仅要多建庙进行祭祀，而且为五通神配妻子，这在其他地方很少有的，除此之外，一般都不敢轻易地谈及它的名字，生怕触犯神灵。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一：

虞伯生集，临川人。少不偶，浪游钱塘。一日，偕杨仲弘、范德机访微炼师于湖西，求召仙鬼。练师置箕悬笔，书符作法，有顷，箕动笔运，书曰：“某当境神也。”炼师叱曰：“吾不召汝！”复书曰：“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达上帝，以求升耳。”众劝伯生许之。翼日，文成，焚之湖滨。逾旬，再诣炼师祷召，神复降曰：“某已获授城隍，谨候谒谢。公必贵显。幸毋自忽。”既而伯生由校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封仁寿郡公，始信神言之不妄也。

这一记载，反映的是杭州的巫术文化，由于人们相信鬼神之事，因此就很容易让外来的巫师能够站稳脚跟，获得人们的信任。从这一点上来说，浙江等地的民间风俗很朴实，他们相信鬼神，所有这一切都因此有了巫术文化存在的基础和条件。